

资金短缺下市场如何运作*

——浦镇轻纺产业资金链中的社会时间机制

李英飞

提要:本文以浦镇轻纺产业为个案,通过引入社会时间机制来说明在资金短缺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中小企业如何借助生产链上的大规模逐级“欠账”和成本分摊来实现融资和持续运转。本文的分析从关系合同出发,在市场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维度上加入了合同的时间维度,即所谓的社会时间机制,以此来打开交易过程中的信用概念,强调还款能力及还款周期对企业资金流转的限制,用以解释交易双方在无第三方信用担保的情况下,是如何借助社会时间机制形成的资金结算周期来适应和促进整个市场的运作和发展的。

关键词:欠账 关系合同 资金链 社会时间机制

一、研究问题

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的金融体制仍然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融资环境的限制,一方面是因为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原先“赶超”型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如主要服务于大企业的国有大银行),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林毅夫等人称之为“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林毅夫、李永军,2001),而且还存在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歧视(林汉川等,2003);另一方面是因为用以弥补该金融体制而出现的配套金融体制却相对滞后,且难以满足数量庞大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中小企业的需求。比如,樊纲认为,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需要发展“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以完善金融体系(樊纲,

* 本文曾在第三届社会理论工作坊“组织与制度研究”专题讨论会上宣读,得到了曹正汉、刘世定、张静、李友梅等教授的批评和建议;另外,折晓叶教授、渠敬东教授及杨清媚、李荣山等师友也提出了诸多批评和建议;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2000),但这种吸引民营资本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却是晚近的事。实际上,用以直接融资的创业板市场的建立是在2000年之后,而且这个融资平台主要针对的是高新技术企业;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要等到2005年国务院颁布“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在融资条件欠缺的情况下起步的,乡村工业中的民营中小企业更是如此。^①

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小企业即使在金融体制如此欠缺的前提下,仍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迫使研究者转向关注金融体制之外的融资渠道,诸如地下钱庄、标会,甚至是高利贷等渠道。以温州的民间金融为例,在温州有民间借贷、行业信贷、标会、抬会等多种融资途径(王晓毅等,2004:61-62;张翔,2000;郭斌、刘曼路,2002)。然而,无论是金融体系下的融资途径,还是金融体制外的民间金融,由于这些金融服务的目的在于盈利,因此中小企业需要为借贷的资金支付一定的利息。因此,中小企业面对的是“正规资金供给渠道缺乏与非正规资金供给成本过高的双重制约”(周密,2007)。准确地讲,正规融资渠道的成本也是不低的。随着中国经济产能过剩,人民币汇率上升,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基于此类融资渠道的中小企业主,极易受国际市场行情等情况的影响而出现资金链断裂。中小企业因巨大的还贷压力而出现“跑路”,或因银行指定信用联保形成的“担保链”和企业间“三角债”等原因出现的成批倒闭等现象,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资金短缺的原因,一方面是融资途径受限,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主为了规避风险有意限制借贷规模造成的。那么,在这种资金短缺的条件下,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作为市场主体的中小企业,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具体运作过程中资金短缺问题的途径呢?

从分析的策略来看,金融系统的信贷和民间金融的借贷,可以归之为“可见的”融资途径,即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经济学着重研究的融资渠道;显然,还有一条“不可见的”融资途径。这条渠道只能从企业自身的资金链上去找。^② 企业资金链上的融资,是指企业主通过控制

①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乡村工业中的民营中小企业。从金融系统来看,乡村工业的融资途径,起先是由中国农业银行系统下设的信用社提供,1996年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后转由农村信用社提供。

② 企业内部融资,比如内部股份制,但涉及到股权或利益分红问题,私营企业主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大都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采用,这部分融资毕竟有限。

产业链上的资金流转周期和现金流的规模来实现的,即以最少资金占用量来带动整条生产链的运转。^①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地节省现金用量和提升资金流转速度。然而,提升资金流转速度往往会受到生产中的硬性条件的限制,比如劳动强度、技术水平、物流速度,等等,除非有技术革新,否则企业很难有大的提升。相比而言,尽可能节省现金用量是可行的。这条就是本文讨论的“不可见的”融资渠道,即借助产业链实现的企业间的大规模、结构化的延期支付现象。或者说,正是基于大规模的“欠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成本分摊,才促成了中小企业的快速和长足发展,而这一点经济学未给予足够重视,只将其当作一种普遍存在的欠账或延期支付的普通现象。

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这种经济学未给予足够重视的“欠账”现象。这种延期支付或“欠账”现象,尽管也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但本文无意于讨论诸如日常生活中基于互助性质的赊欠,或者所谓“赊欠文化”影响下的农村赊欠现象(耿言虎,2014),而是要关注“欠账”是如何与生产过程中的资金流转周期相配合,并以此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和促使其不断发展的。由于合同理论是理解市场关系的重要维度,而“欠账”行为是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中发生的,因此,本文的讨论将在此基础上展开。

二、合同的时间维度:概念与解释维度

(一)关系合同与市场权力

在经济学文献中,合同理论最初在奥利弗·威廉姆森、后在奥利弗·哈特等人的努力下逐步发展完善,并最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从分析市场与组织关系到产权问题的理论体系(周雪光,2003:221-230)。威廉姆森为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市场交易一体化问题,从法律治理的层面,区分了三种合同形式:古典的、新古典的和关系合同。其

^① 该融资方式与供应链融资不同,尽管两者都是借助企业间的上下游关系实现的融资,但供应链强调的是把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合成一个整体,通过挂靠信誉良好的大型企业向商业银行融资,仍然是一种金融产品。而这里所讨论的资金链融资,是通过上下游“欠账”来实现的,它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松散的、无需支付利息的融资形式。与供应链融资类似的还有诸如物流银行、融通仓等金融产品,但都与本文所讨论的融资有所区别。

中,关系合同在承认合同不完备性的前提下,把法律治理结构转化为具体双边或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从而为我们分析组织间行为和内部治理提供了一个制度视角的分析框架(威廉姆森,2002:68-104;周雪光,2003:222-223;Macneil,1978)。简单地说,威廉姆森通过引入关系合同,将资产专用性等问题引入组织间行为研究,比如“要挟”,签约后存在的“道德风险”等问题。而哈特则认为,在这个不完备合同中,资产的剩余权力才是解决合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关键(哈特,2006)。这样,他就把威廉姆森的组织边界问题转换成了产权分配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威廉姆森还是哈特,他们的讨论都隐含了一个假设,即组织间交易是可达成的,而本文讨论的资金短缺似乎意味着达成交易的条件都欠缺。因此,本文的关注点与威廉姆森、哈特等人强调合同内容和执行情况不同,将着重讨论达成合同的社会条件和内在机制。显然,“欠账”更是在关系合同的基础上,借助于某种方式不断调整出来的交易关系。所以,如果从关系合同的双边治理框架来看,合同关系的存在必定要借助于交易双方权利和利益之外的因素。刘世定认为,由于关系合同隐含地假定了“虽不完全但却相当良好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导致了“和‘关系’本身相联系的一些重要特征被忽略了”(刘世定,1999),也就是说,关系本身是合同的重要基础。比如,蔡禾和贾文娟的研究中,路桥建设业的包工头,因工程款无法及时到位而出现的工资发放“逆差序格局”,延迟支付核心工人工资,就体现出了关系的重要性(蔡禾、贾文娟,2009)。而在另一项研究中,艾云和周雪光发现,市场的兴起是可以在资本缺失的条件下发生的,也就是说,欠账可以通过市场权力的“强制力量”(强征性信用)与地方代理人基于村庄共同体的各种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来实现(艾云、周雪光,2013)。^①格兰诺维特所强调的社会关系的信用作用(Granovetter,1985)进而被他们替换成了市场权力的强征性信用。但不管怎样,在解释机制上,这两项研究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即,欠账涉及到的实质问题是资金流转的周期,而市场权力或社会关系的信用作用究竟如何搭建两

^① 周雪光在区分哈特合同理论的权力概念时,尤其强调了哈特所提到的权力是指剩余资产的所有权,而不是博弈论所讨论的市场力量意义上的权力(周雪光,2003:225-226),也就是这里讨论的市场权力。

者之间的关系仍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在更为基础的细微环节,这两种解释机制仍显得抽象。

(二) 合同约束软化:产权观念和资金支付周期问题

一般而言,由于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除非因为大的宏观环境的变化,比如市场行情不景气,企业一般不会做出不利于自身的“欠账”行为。即便是出现延迟支付,也会依赖第三方的信用担保,例如基于商业银行的分期付款,企业间交易常用的承兑汇票,等等。实际上,为了规避风险,在无第三方信用担保的交易中往往采取现金交易。但事实上,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企业间相互欠账的行为。显然,对于社区里的企业(折晓叶、陈婴婴,2004),这种欠账行为就会变得理所当然。因为相比于陌生市场交易关系,这里的交易主体间的合同约束已经被软化了。

有关合同约束软化,在乡镇企业转制研究中有很多讨论。比如,刘世定就曾从经营代理人与其人际网络的“二次嵌入”(二次合同)的角度,来详细解释乡镇企业中合同约束关系如何被软化,以及经营代理人如何获得产权的剩余控制权(刘世定,1999)。实际上,乡镇企业的情况更为复杂,比如周雪光从关系产权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乡镇企业产权会出现模糊不清和不断演变现象,他认为其根源在于乡镇企业为了获取资源而不得不以适应复杂环境的方式做出改变(周雪光,2005);而且刘世定从占有的三个维度也解释了这种复杂性(刘世定,2003)。事实上,产权约束的软化,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借助社区的某种机制可以软化约束关系,而这种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恰恰是因为经济关系被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波兰尼,2013;格兰诺维特,2008)。所以,在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中,其信任机制往往并非建立在严格的合同关系基础上。

正如涂尔干谈到契约时所指出的,契约关系能够成立是因为有其他更为基础的非个人因素的存在(涂尔干,2000:185),而这种非个人因素便是社会性的约定。折晓叶和陈婴婴认为,社区里通行的是基于互惠关系的社会性合约(折晓叶、陈婴婴,2005)。因此,社区里的中小企业的市场交易也会因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而受社会性合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欠账所依赖的信任机制也是一种社会性合约。比如,下文要讨论的YQS案例中,他与家庭织机户交易的时候,往往都是口

头约定。所以,欠账依赖的是社会性合约。不仅如此,在这种社会性合约里,还隐含着一些这些货物或钱财是可以“借用”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期限内,一方可以把财产让渡给另一方无偿使用。而这一点正是接下来讨论合同关系达成的内在机制的重要切入点。这种财产有限让渡使用的观念,一方面表明,欠账不同于金融体制和民间的融资,它可以直接节省现金流而无需支付利息;另一方面也表明,欠账并不是无限期的,会受社会性合约中的时间限制。

因此,“欠账”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欠款能够在这种社会性合约的规定期限内及时返还。不仅如此,这种及时返还不仅体现为一种还款能力,更体现为一种持续欠款的能力。所以,信用或信誉好,并不代表就能够欠到账。欠账还与有较好信誉的交易方是否有足够资金实力还款有关。在市场交易中,尤其是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实践后,被欠方明确知道这是给对方垫本,且他们也无法获得被延迟支付的这部分资金的收益,那么,他们能够接受的惟一前提是,在可以让渡使用的期限内(通常是按照社会性合约中的时间期限),对方能及时返还所欠款。因此,信用内容就变成了及时还款的能力。所以,欠款的信用机制是后置式的,这种情况在无第三方信用担保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欠账把资金结算周期拉长,用以解决达成交易合同时的资金短缺问题。但由于社会性合约中的时间要求,就迫使具有市场权力的一方在转嫁资金压力时,必须遵从社会性合约中的还款时间。同时,具有市场权力的一方,也最大程度地推延了支付周期,即把较快的生产和经营上的资金流转周期建立在了社会经济生活中较慢的资金使用周期之上。这样通过两种周期之间的时间差来欠账,既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在可接受的还款期限范围内,又能保证经济生产。较快的经济生产周期产生的利润,在支付欠款之后,仍然可以不断扩大生产,实现资本积累。为了区别于经济生产经营的时间周期,本文把按照社会经济生活资金使用周期及时还款的时间,也即社会性合约规定的时间,称作社会时间。

(三) 社会时间机制:一种社会学解释维度

社区里的企业,往往可以借助具有人格化的社会资本,把交易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无需借助第三方信用担保,就能达到延迟支付的

目的。市场权力的引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延迟支付的能力,比如,生产链上游供应商,如果不让下游厂商欠账,就有滞销的风险。但最终欠账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它借助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资金使用周期。因此,社会时间就成为考察欠账与中小企业资金链上的资金流动周期微妙关系的关键环节。^①

所谓社会时间,是指特定社会或集体生活节奏形成的时间单位,在本文,主要包括周期性的节日和家庭生活中重要事件出现的时间点。前者最典型的是春节,通常称为“年底”;后者是指围绕婚丧嫁娶,或子女上学等重要事件出现的日期。^②此外,还可以包括基于一定社会关系约定的惯例时间安排,比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农村社区常用的资金结算周期中的按季度结算、半年一结。^③事实上,有关时间的社会性有大量的研究(马克思,2008;涂尔干,1999;Mead,2002;Giddens,1984)。比如,涂尔干认为,“日期、星期、月份和年份等等的区别,与仪式、节日以及公共仪典的周期性重现都是相互对应的”,也就是说,“日历表达了集体活动的节奏,同时又具有保证这些活动的规则性的功能”(涂尔干,1999:12)。此外,于贝尔解释的神圣性如何在重要时刻打断持续性时间的作用(Hubert,1999),还有索罗金和默顿提出的关于时间的各种制度与社会协作直接相关(Sorokin & Merton,1937),以及吉登斯所说的惯例(Giddens,1984),都构成了本文定义的社会时间的重要内容。而且,从中还可以看到,基于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所形成的节奏和重要日子,在性质上与天文时间或物理时间有所不同,即社会时间是非连续性的(Mukerjee,1943),具有“可逆性”或周期性特征。

与社会时间不同,工业资本主义的时间体系,本质上是基于线性时间和计算理性发展出来的商品化了的时间(哈萨德编,2009:14-16;马克思,2008;Thompson,1967;Thrift,1981)。按照慕克吉的说法,工业

① 不仅如此,社会时间还成为欠账和追账的合法性基础。由于交易双方置身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所以,在具体的交易中,由于资金短缺,欠账变得理所应当;同时,作为被欠账一方,尽管大多数欠账都会按照社会时间来结算,但也会有逾期未能结算的。通常的做法是,被欠账一方会依据社会时间并以此为正当理由,比如年底春节,到欠账人家里追账,如果还未追到,只能进入下一个社会时间周期。限于文章讨论的主题,这里不做深入讨论。

② 农村社会中,由于农业生产节奏的关系,也会出现需要使用大量资金的时间点,比如播种、施肥期,但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地位下降,这些时间点逐渐失去其重大性,因此,在调查中,涉及到要为农业生产调用资金的情况几乎没有,所以,该情况暂不考虑。

③ 从维持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正常运转来看,这些结算周期与社会时间维系社会生活政策秩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节奏,遵循的不是生活的节奏,而是由机器体系的速度来支配的(Mukerjee, 1943)。由于统一时间的出现,不同企业、市场之间的生产、交易以及其他经济活动方面的节奏,比如资金流转、物流体系等速度和时间,更加紧凑,其衔接更加符合经济理性。也就是说,时间被做成了计时系统,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机制,比如泰勒式的时间管理,以及计时工资等等(马克思,2008)。然而,当这种时间系统与社会时间节奏遭遇时,按照波兰尼的看法,势必会为更为理性化的形式所代替(波兰尼,2013:153-155),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按照尼兰德的看法,这种按照经济效益来理性安排时间的举措,扩展到了生产、流通、交换等各个环节时,出现了标准工作时间的一系列争论和政治运动(Nyland, 1986)。也就是说,工人需要在经济时间系统内重新争取属于社会生活(自由时间)的时间,而事实上,像工资的结算周期,比如周薪、月薪,也不是经济系统自然产生的时间机制,而是一种社会时间产生的机制,并在经济系统里产生了作用。

因此,我们看到了类似布尔迪厄所说的阿尔及利亚农民对自然时间节奏的依赖(Bourdieu, 1963),也就是说,社会时间仍有其地位,而且还可以产生某种机制在另一个系统里发挥作用。正如杨所说的,时间不只是社会互动的尺度,也是社会互动的工具(Young, 2002),因此,合同关系中出现以社会时间作为资金结算期限时,双方不但基本社会经济生活未受影响,而且各自还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那么,这种以社会时间作为支付期限并形成的结算周期,就可称之为社会时间机制。接下来,本文将以浦镇的轻纺产业为个案来说明,中小企业借助社会时间机制实现的“欠账”,是如何与生产过程中的资金流转周期相配合来解决资金短缺和获得发展的。

三、案例

浦镇位于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展轻纺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该镇已经发展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纺织基地,比如2009年浦镇的里子布的产量甚至占到了全国的2.5%。从规模上来看,浦镇的产业规模增长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0、200台织机发展到2014年的35000多台,家庭织机户也从只有三四个村

庄的 100 来户发展到目前涉及 11 个行政村(共 14 个行政村)的 2200 多户。2013 年 1-12 月份,该镇轻纺产业总产值达到 235 亿元。按照该县划分的经济指标,全年销售收入超 2000 万元的规模企业达到了 84 家(占到全县规上企业的 14%),其他不足 2000 万元的有 196 多家。

在浦镇轻纺业的发展中,资金短缺一直存在,但解决的途径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早期发展主要是以个体户为主,由于生产规模较小,资金短缺主要通过向亲属、朋友等借款来解决,而在具体交易中较少出现欠账。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 2000 年后,轻纺企业数量和规模迅猛增长,而这种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超出了资本积累的速度。这期间,资金短缺主要通过企业间的相互欠账来解决。下面简要介绍下,社会时间结算周期出现的条件。

(一)集市交易与社会关系:收购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

尽管浦镇的轻纺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开始发展了,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初期,才形成规模,建立了小型地方性轻纺市场。而在这之前,大多数个体户,按照自身的资金限制,都是各自生产,各自到外地跑市场销售。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乡村工业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农闲时间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家庭手工业,另一种是作坊工业(费孝通,1999:7)。这两种工业的区别是,前者利用的是剩余劳力,后者是利用过剩的资本。显然,进入 1990 年代后,浦镇发展出了作坊工业。

由于地方性的轻纺市场的出现,大量外地坯布收购商来到浦镇。外地收购商的到来,逐渐打破了浦镇原先按照亲属、朋友等关系扩展的缓慢发展的模式,开始形成以地方代理人为中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生产和销售模式。因此,这期间的社会关系与接下来讨论的社会关系作用不同。这期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主要作用是在集市销售时获取信息和资源,而接下来要讨论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是,借助这个社会关系网来对生产链上的中小企业或家庭织机户欠账。以 WLC 为例来说明:

案例 1:1986 年,WLC16 岁初中毕业后,到了镇上的一家纺织厂做保健工(机修工)。做了 2-3 年后,WLC 回家买了 2 台有梭织机,与他的父亲和妹妹一起做起了纺织,那时候织完的布,需要自己到公路边摆摊卖。20 岁的时候(1990 年),通过亲戚家的旅店,WLC 认识了广州、东北等地的布商。因为很多外地布商都住在这家旅店。

认识了这些布商之后,从23岁开始(1993年),WLC就不再到该镇的主干道公路边摆摊卖布了,而是在他家开了一个场地,为这些布商收布,开始做布商的生意。WLC与这些外地来的布商主要做两部分生意:一是把自己家织机织的布卖给对方,二是按照布商的要求,自己去收布再卖给这些布商,从中赚取一部分费用。这种模式一直做到浦镇的轻纺市场建立才结束。在此期间,WLC还专门到轻纺市场租了一个店面做过一段时间的原料、坯布和染色生意,后又转回到了坯布生意。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机,一直做到2003年。

从WLC的案例可以看出,外地收购商借助地方代理人来收布,显然是利用WLC的社会关系网。WLC收购布匹的对象,一部分是先期为外地布商到市场收购时认识筛选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亲戚朋友介绍的,或是从同村、邻村主动找上门的家庭织机户中甄选出来的。总之,WLC对这些商户都很熟悉。随着生意的持续,WLC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收购网。这种社会关系构成的收购型社会关系网,非常类似于来料加工中的“圈子”(王田一,2013;田志鹏,2014),为WLC接下来在90年代中后期包机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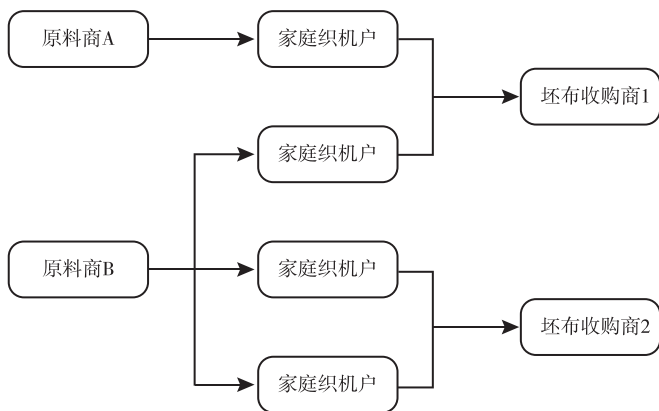


图1 收购型社会关系网络主导的市场交易结构

在集市交易阶段,家庭织机户以地方代理人为联系枢纽,在浦镇开始形成一条从原料商到家庭织机户再到坯布收购商的产业链结构。浦

镇的市场交易结构,也逐渐开始由这些不同的收购型社会关系网构成。

由于该阶段坯布买卖的量比较小,所需资金不多,大多都是现金交易。这期间的资金短缺,主要仍是以向亲属、朋友等筹集借款来解决。

(二)包机模式:以订单为主导的市场权力结构的形成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浦镇逐渐出现了大范围的包机现象。与布商收购模式稍有不同,包机模式的生产经营更依赖于订单。这期间,特别是经历1998-1999年乡镇企业转制之后,随着国内市场的成熟和2000年后国家对“走出去”战略的倡导,原先的坯布地方代理人 and 乡镇企业分流之后的一部分供销人员,开始到各地地方性纺织市场和展销会跑市场,承接了一大批国内和国外订单,包机户由此产生。以YWL为例:

案例2:YWL1992年进入浦镇乡镇企业中的一家印染厂,当时主要负责业务。1998年印染厂转制后,由于熟悉业务,YWL去了广东做纺织贸易。在此期间,YWL在广东卖他父亲的纺织厂织的布和从浦镇收购的布,此外,也在接广东的单子到浦镇找厂加工生产,即到浦镇找家庭织机户包机。到2000年,YWL自己回到浦镇,专门包机,与家庭织机户合作,做外贸订单生意,并成为当地的包机大户,一直做到2003年转行做印染。

由于订单所需的坯布量比较大,以及订单交货期限等限制,浦镇的轻纺业开始出现进一步的分工。具体如图2所示。

其中,承接订单的包机户起到了核心作用。在包机户的推动下,浦镇的产业链出现了新的组织结构。首先,包机出现后,家庭织机户与原料商之间的买卖关系消失,由包机户与原料商之间的交易关系取代,家庭织机户只扮演为包机户加工织造的角色。从具体生产流程来看,包机户按照订单要求先采购原料,经包机户的前道工序^①加工成经丝和纬丝后发放到各家庭织机户;由家庭织机户的织机织成白坯布后回收到包机户手中,统一处理后再销售。主要的市场交易关系如图3所示。^②

① 包机户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生产链的前道工序的生产本地化。

② 由于大多数印染厂包过机,这里为了便于讨论,统一处理为包机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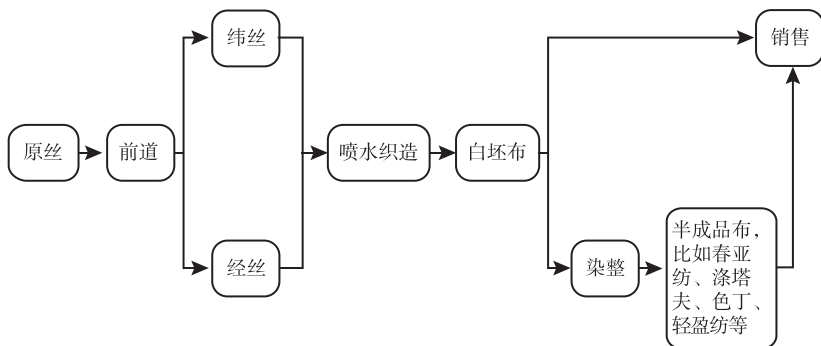


图2 浦镇轻纺业生产工序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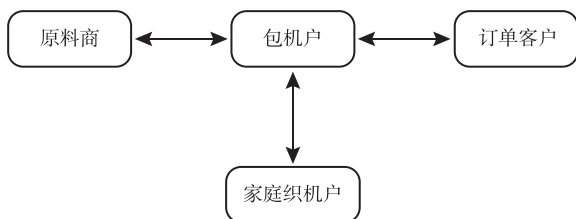


图3 浦镇轻纺业的主要市场交易关系

因此,发展到包机阶段,由国内订单和直接或间接的国际市场订单推动的生产,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原先做收购的地方代理人也逐渐涌现出来,承担起类似包买制基础上的“来料加工”的经纪人角色(傅春晖,2014;田志鹏,2014),原先的收购型社会关系网也开始演变成委托加工型社会关系网。换句话说,以订单为主导的产业链结构,意味着以订单为代表的市场权力开始与人格化的收购型社会关系网结合,并且在浦镇的生产经营结构重新组织化过程中,替代掉了原先的集市销售阶段的那些散户,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隐性工厂”的体制(谢国雄,1992)。也就是说,如果家庭织机户不与包机户合作,就无法加入这个“隐性工厂”体制内参与生产,它将无以立足。原先一直做家庭织造的家庭织机户独自一家,既无法满足订单所需要的产量,也无法承担自己建立纺织厂的巨额费用。^①与此同时,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的

^① 这也是这期间纺织厂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先期有积累和经济实力的包机户都成立了纺织厂。

包机户,却又不得不面对资金短缺的难题。首先,为了获得订单,包机户通常需要超出自身资金实力来收购坯布;其次,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能的提升,到90年代中后期,坯布利润率开始逐年下降,比如坯布利润从90年代末的2-3元/米降到了2014年的3分左右/米,赢利能力的下降也造成了资金的不足。所以,面临着双重压力,具有市场权力和具有人格化委托加工型社会关系网的中小企业主——这里的包机户,^①开始调整与上游合同中的资金结算周期,以解决运营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四、社会时间机制的两种表现:逐级欠账与成本分摊

从融资成本的角度看,借助亲属或朋友关系的借款来获得启动和日常运营资金的融资,无疑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但借助这些所谓“强关系”^②的信任作担保,所能融资的额度会严重受到关系的限制。因为仅凭亲属或朋友,以及由这些关系扩展的借款,要获得启动资金和日常所需的资金,要么不够,要么随着社会关系的扩展,借贷所需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而且,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若因资金短缺而不断向亲属或朋友借款,会有损信任关系,因为这在一般人看来,这会是经营不善或不断亏损的信号。为了避免风险,亲属和朋友等也不愿意借款。所以,每个借款人所能借到的总额度,随着社会关系的逐渐扩展和付出成本的增加,最终是收敛的。

相反,借助产业链上的市场权力和委托加工型社会关系网,通过与上游协商推延资金结算周期,使企业的资金回笼速度快于与上游的结

① 在这里,包机户和纺织厂具有同等含义。随着整个市场结构的变化,浦镇出现了一大批纺织厂,但其实质仍然是包机户角色,也就是说,存在两种形式的包机:一种是包机户与家庭织机户之间的包机,另一种是纺织厂与家庭织机户之间的包机。由于当地大部分纺织厂都是由包机户发展而来的,本身就是大包机户,故统称为包机户。在浦镇,具体有两类纺织厂:一种是完全或大部分自己织造坯布的纺织厂,但这类纺织厂数量很少;另一种纺织厂是梭织部分(即家庭织机户采用的织造技术)采用包机,即所有包机户包机经营的都是梭织,针织的部分自己购买织机织造,但由于针织机器昂贵,通常100、200万一台,难以在家庭织机这个层面普及,只有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几家纺织厂在发展这类织造。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家庭织机户与包机户之间的梭织类纺织业情况。

② 这里“强关系”的用法与格兰诺维特一致(Granovetter, 1973),相比而言,委托加工型的社会关系网中的关系则属于“弱关系”。

算周期,即通过先向上游欠账,待资金回笼后再返还欠款的方式来解决资金短缺,反倒是可行的。而且,这种融资途径不同于借贷,其优势还在于无需支付所欠款利息。因此,包机户在与上游调整资金结算周期过程中,选择了社区中通行的社会时间为结算周期,进而争取到了最大的资金流转和积累的空间。

这种做法,最终在浦镇表现为两种说法:一种是“现在做生意没有不欠账的”,另一种是“现在做生意都可以欠账的,只要有基本的启动资金就可以做”。前者体现为基于社会时间机制的欠账,后者体现为某个经营主体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借助社会时间机制得以分摊。也就是说,包机户的这种做法被逐级仿效了。

(一) 逐级欠账及资金流转周期:资金如何有效利用

1. “可以欠账”和“一起结算”

尽管“现在做生意没有不欠账的”的说法并不能直接说明欠账与资金流转周期之间的关系,但该镇目前包机达到 700 台左右的某纺织厂 YQS,作为该镇第二大包机户,有一个说法:“浦镇的轻纺生意不欠账做不大,个个欠”,却能印证欠账对轻纺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在浦镇做生意都可以欠得到账,但同时也指明了,作为被欠账的一方,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事实角度,都是可以接受欠账的,也即实物或货币是可以有限让渡使用的。这是社区内普遍存在的一种互惠观念。下面以原料供应商 DZL 来说明:

案例 3: DZL 是浦镇第一家社办企业(绸厂)的党委书记,他专门讲了个故事:他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给女婿在轻纺市场租了几家店面,做原丝生意,但他女婿生意做得很不好,店面很冷清。结果一问才知道,他的女婿卖原丝时,都要求买家现款交易且付全款。之后, DZL 让他女婿在店里看他怎么卖丝。当他女婿看到他卖给第一个人时,没要钱,欠给对方,他马上不愿意了,出面阻止;但被 DZL 坚持卖给对方了。接着,来了另一个买家, DZL 坚持要对方付全款后才能把丝拿走。等买家走后,他女婿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前一个可以欠,而这个人不能欠给他。 DZL 说,你对这些人不了解,有人绝对可以欠,你放心欠给他;但有些人绝对不能欠账。

从 DZL 案例可以看到,欠与不欠,是对这些人的熟悉,而熟悉意味着,能保证欠账的人将来能及时支付货款。也就是说,发展到 90 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个个欠”的背景下,DZL 女婿的行为显然有违社区内的交易规则,但“可以欠账给谁”仍是他无法理解和体认的。DZL 之所以能够判断得出来,是因为他不但担任过第一家社办企业的党委书记,而且在任职工办领导时,他对这些纺织行业内的人都很熟悉,这些人谁的信誉好,谁的生意做成什么样,他都清楚,所以,他很容易判断可以欠账给谁。换句话说,只要是此人信誉不错,又有能力偿还,生意做得还可以,都是可以欠账的对象。因此,DZL 可以让对方“先使用,后付款”。

不仅原料供应商如此,家庭织机户的工人,在限定的条件下,也能够接受工资延期支付。比如家庭织机户 JSJ,他家的挡车工基本上都是(阴历)年底一起结算工资的,按照他的说法,很多工人平时也用不了多少钱,还有就是工人也怕自己拿到工资忍不住全花了,存不下钱,他们也愿意存在他这里。包机户的工人也存在这种情况,包机户 XRG 说,有拿走的,“也有放在包机户这里的”,年底一起结算的,因为每个月结算其实没多少钱,每次结算嫌麻烦,“自己选择”。而实际上,家庭织机户比较普遍的态度是,“大家都这样做(欠账)”,也没办法,每次结算也不好意思。所以,年底“一起结算”成为了一种通行的做法。

2. 逐级欠账:市场权力下的社会时间机制及其表现

实际上,上文已经出现了按照社会时间来结算。如果从轻纺产业纵向的生产链各环节来看,包机户模式下的整条产业资金链出现了有结构成规模的逐级欠账。即,从包机户到家庭织机户,再到家庭织机户工人,加工费和工资的结算周期是按照社会时间来执行的。这里结算周期主要依据的时间点是阴历年底,或是日常生活中遇到重要事件时。前者是固定的,后者通常较为灵活。其中,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重要事件,是指婚丧嫁娶、子女上学、买房买车等,需要用到大额资金。从支付货款的角度看,包机户平时从原料商那里可以直接拿货,也不用向家庭织机户支付全部加工费,而只有当上游遇到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问题时,包机户才必须预支付给上游一定量的资金,但剩余的所有货款则在阴历年底结清。

这样,“欠账”的规则简单地可以总结为:预付日常基本开支,留存剩余资金。因此,这里不同于艾云与周雪光所讲的赊欠过程出现的“空手套白狼”(艾云、周雪光,2013),在整个欠账账单里有一部分资金

是不能欠账的,而这部分资金正是维持和维系上游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的费用。比如,前文提到的包机大户 YQS,在讲他与上游客户结算时,特别用到“养活”这些家庭织机户的说法,也就是说,“养活”即是要维系日常生活,但同时要到阴历年底才能把剩余加工费全部结算给对方。这也是“欠账”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之一。所以,支付清单被迫分为两个部分,各部分又分别按照不同的社会时间周期运作。这种社会时间即不同的结算周期,从家庭织机户那里又被推行到织机户工人那里。以家庭织机户 JSJ 为例:

案例 4:JSJ,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加入家庭织造行列,1996 年开始包机,为包机户加工坯布。JSJ 说,80 年代,老板来浦镇收布都是现金;1990-1995 年,自己卖布也是现金交易。从 1996 年开始,与当地包机户合作时,就只拿加工费了。加工费结算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每月预付,这部分加工费在每月 25 号结算,通常会拖到 28 号,因为每月 25 号要交电费,而电费可以延迟三天交,之后要交滞纳金。以 2014 年为例,这部分金额为每月 1000 块/台,用以支付日常基本费用,这部分另外还包括织机户工人的日常开支等费用。其余加工费会在年底一起算总账,但现在加工费已经降到 3 分/米了。在自己家的车间里,JSJ 还招了几名安庆人。外地工人平时都住在他们家里,属于食宿全包,工资在年底结算,平时遇到急需,比如婚丧嫁娶、小孩上学等,会提前支付工资。JSJ 举了一个例子,90 年代末(应该在 1996-1999 年之间),工人一年可以拿到 5000-6000 元/年,年底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工人都很开心。

JSJ 的案例说明,从 1996 年开始,当以订单为核心的生产经营模式被推行下来之后,这种“欠账”也随之更为固定化且无法选择。而由于包机户每次只给基本费用,没有充足的资金,JSJ 也无法全额支付工人工资,所以,JSJ 也是按照包机户与他之间的资金交接的方式,经过一定改变推行到工人身上。实际上,在浦镇通行的做法是:对外地工人包食宿,由于本地工人可以住自己家里,所以要解决一顿饭;平时遇到急事或重要时期,预支一部分工资,其余到年底结算。因此,在浦镇,从包机户到家庭织机户,再到织机户工人,是一个逐级欠账的过程。此外,

围绕包机户,还存在着包机户对上游原料供应商欠账和对包机户工人工资的欠账的情况。具体欠账关系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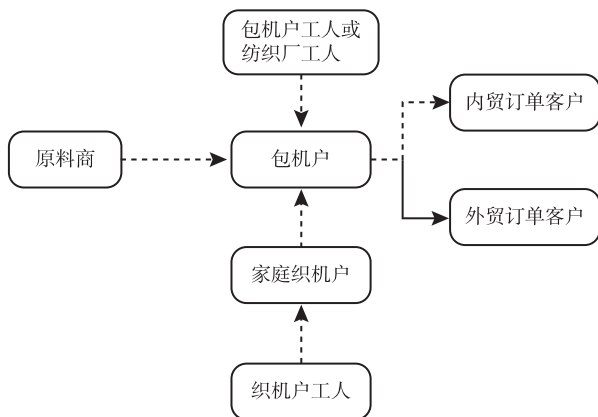


图4 浦镇轻纺生产链上的主要欠账关系

图3的市场交易关系,也进一步发展成为图4的资金结算关系,其中,虚线表示欠账,虚线的箭头表示欠账的关系,即箭头所指者为欠债一方。在图4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欠账关系都是围绕包机户而展开的,或者说,是通过包机户在生产链上实现逐级欠账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订单客户不同,还会出现订单客户与包机户之间的欠账关系,由于已经超出浦镇范围,这里暂不做讨论。但不同的订单客户,对包机户调整不同层级的欠账关系、更有效利用现有资金直接相关。

3. 最有效利用和节省资金:两种不同的资金流转周期

所谓欠账,就是利用社会时间机制来打两种资金流转周期的时间差:第一种时间周期是,维系织机工人(比如挡车工)、家庭织机户等日常社会生活秩序的资金使用周期,即社会时间周期;第二种时间周期是,包机户或企业订单生产销售交易过程中的资金流转周期。由于还款的时间点对企业的资金流转周期有着重要的限制作用,所以,如何尽可能地让社会时间的周期最有利于生产经营的资金流转周期,就成为具有市场优势的一方最为有效的利用和节省资金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在包机阶段,在产业资金链上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资金流转周期(参见图3):第一种是在原料商、包机户和订单客户之间的资

金流转周期,第二种是在包机户和家庭织机户之间的流转周期。前一种是按照生产到销售的周期来调整的,也就是说,是按照订单的周期来协调的。在铺镇,一般而言,从原料采购到白坯布再到客户,周期在2-3个月,如果遇到外贸还需加上染整和出口运输等时间,一般在45天,因此,如果是以外贸为主的包机户,一批货的资金周转在4个月左右,而以国内贸易为主的在2-3个月。从资金流转速度来看,第二种资金流转周期选择结算的社会时间点已经最大程度地推延了支付时间,这就使得第一种资金流转速度能够远远超出其流转速度,也就是说,第一种横向的资金流转周期,在交易完成获得收益后,并不需要及时给纵向的家庭织机户足额支付加工费,而是留存了很大一部分用作日常的流动资金,或作资本积累。

先来看横向的第一种资金流转周期。由于从原料到成品实现价值的周期有3个月左右之久,所以,很多纺织企业(即大包机户)工资发放时前3个月是不发的:从第4个月开始发第一个月的工资,依次类推,然后到年底发剩下3个月的工资,^①也就是说,年初第一批货的回款一般要到3个月后才能收到。那么,一个订单的生产销售周期恰好与社区里通行的结算惯例,比如这里的按季度结算相契合。所以,这里又利用了社会时间,积压了3个月的工资。不仅如此,由于生产的批次是持续累积性的,所以,下游企业销售交易实现的资金回笼速度仍然快于与上游企业资金流结算周期。由于该时间周期并不是按照经济生产交易周期的一致性结算,而是借助上下游良好的合作关系,即按照结算惯例来结算,所以,社会时间机制又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两种资金流转周期的配合下,包机户不但积累了资本,而且更充分地利用了现有资金。

相比于第一种资金周转周期,第二种资金结算主要有两种方式:月计和年计,即前文总结的每月给基本费用,剩余加工费年底结清。每月预支的是维持家庭织机户正常运作的基本费用,具体包括:电费、税、污水费和工资等。在包机户与家庭织机户,以及通过家庭织机户又与织机户工人之间,按照社会时间发生的欠账关系,同样为包机户节省了大量资金。因此,在图4的欠账关系中,横向的资金链主要呈现的是便于

^① 由于2007年底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通过,在政府的推动和监督下,从2008年开始,要求企业采取每月足额发放工资,不再采取平时发放生活费、年底结清工资的做法。但这里显然还未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落实,平时发放生活费、年底结清工资的做法仍在包机户和家庭织机户之间采用,这部分内容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包机户最有效地利用现金流的关系,而纵向的资金链主要呈现的是有利于包机户节省现金流的关系。这两个方向的资金链所达到的这种节省资金和有效利用现有流动资金的效果,都是基于社会时间机制来完成的。

(二)成本分摊:一种集体或社会成本?

在生产链上,包机户利用社会时间机制促成的资金结算周期,实现了图4中横向和纵向上的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包机户还借助社会时间机制实现了生产和经营成本的分摊。成本分摊,是指包机户借助欠账的方式,让与之有交易关系的对方承担本属于他的生产经营成本。也就是说,借助社会时间机制,包机户不仅实现了产业资金链上的逐级欠账,还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本分摊。^①这种做法同样被逐级仿效。由于这种成本的分摊,也发生在市场权力和委托加工型社会关系网的条件下,所以同样起到了无需花费任何欠款利息就能融到资的效果。下面仍以包机户为例进行说明。

虽然图4表达的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欠账关系,但若从欠账的总额度的构成来看,即各经济主体间表示交易关系的虚线的箭头改变方向后,呈现在图5中的即是成本如何被分摊掉了的关系。

如图5所示,包机户拿到订单后,他生产某个订单所需花费的成本,比如原料成本,人工成本等,总体上来看,很大一部分是这张关系图中虚线箭头指向的原料商、家庭织机户、包机户工人或纺织厂工人和织机户工人来承担的。简单地说,包机户可以把每个订单的生产,通过欠账的方式把大部分成本分摊到各个与之具有交易关系的生产和经营主体身上。下面以ZXZ的纺织厂为例来说明:

案例5:ZXZ纺织厂的坯布都是通过包机,即由当地的家庭织机户代加工的。按照ZXZ的介绍,原料都是从多年合作的原料商那里欠账过来的,坯布是通过包机(2004年曾达到700多台织机),或是,产量不够的时候通过向包机户欠账过来的。在其日常生产经营成本构成中,自筹资金占1/5,原料占到1/3-1/4,加工费占到1/5。

^① 实际上,除了社会时间机制促成的分摊之外,诸如家庭织机户自购织机也是对包机户的一种固定资产的成本分摊。这里仅从资金链的角度来考察生产链合作促成的成本分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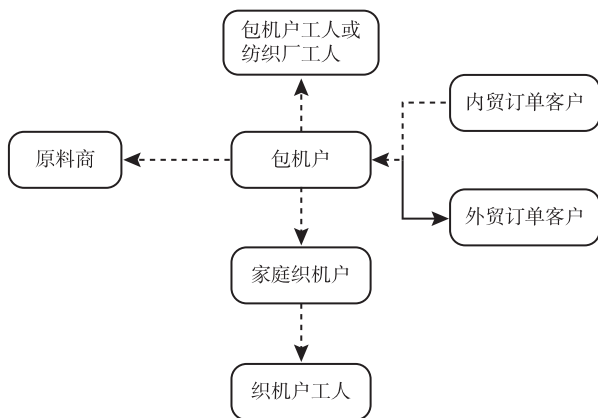


图5 浦镇包机户生产成本构成关系^①

ZXZ 与各原料商、包机户等的资金结算关系,采取的也是社会时间周期来结算的。因此,从 ZXZ 的案例中可以看到,ZXZ 实际投入成本只占到总成本的 20%。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时间机制来打订单生产销售的资金结算周期与社会时间结算周期的时间差,ZXZ 就可以用较少的资金盘活整个企业,实现仅凭自有资金无法做到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与逐级欠账不同的是,逐级欠账是通过包机户的订单来带动浦镇整个轻纺产业发展的,资金短缺的压力被纵向地逐级转嫁出去了;而成本分摊则进一步说明,这个产业链中的家庭织机户、包机户等的生产经营成本是如何被纵向和横向地分摊掉的。同时,这种分摊机制也说明,办企业的资金门槛也降低了,正所谓“现在做生意都可以欠账的,只要有基本的启动资金就可以做”。

如果再回到产业规模来看,以 2011 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全镇的整个纺织业构成中,包机 100 台左右的有 80 人,300 台左右的有 25 人,500 台左右的有 10 人,这些几乎涵盖了当年所有织机的包机户,之所以能支撑起浦镇的整个纺织业,借助的正是这种成本的分摊。也就是说,逐级欠账和成本分摊,支撑并解决了该镇轻纺产业的资金短缺,同

^① 外贸订单到货即给货款,不会出现内贸订单欠款现象,所以不是虚线,也不是分摊部分。由于外贸的这种特征,资金短缺的各包机户或纺织厂、印染厂,近期都在大力发展外贸,外贸的占比一般都在 50% 及以上。

时还推进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换句话说,该镇的轻纺产业发展,借助的是一种基于社会时间机制形成的集体或社会成本。

五、社会时间的反补机制

尽管社会时间机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逐级欠账和成本分摊,但是处于上游的原料供应商或家庭织机户仍会因为各种突发或偶然情况而出现资金短缺问题,而这些资金需求,既可能是因为未到约定的社会时间的资金结算周期而得不到下游包机户的回款,又可能是超出包机户预支付给上游的日常基本开支。为了保证上游“存活”下来,下游的包机户要“养活”上游,在包机户和家庭织机户、包机户与原料供应商之间形成了一种反补机制,即通过欠账或借贷的弥补形式来解决上游资金短缺问题。

这种反补机制的向度不仅与图4中欠账的向度不同,而且还遵循着与之不同的逻辑。具体来说,这种反补机制不是简单地把欠款提前支付给上游的原料供应商和家庭织机户,而是保持原有社会时间的资金结算周期前提下,再在包机户与家庭织机户或包机户与原料供应商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相互欠账机制。这种欠账与包机户欠账不同,原料供应商和家庭织机户要为这种欠账付出一定的成本,而这种成本正是由包机户在整个生产和经营架构里占有的优势市场地位造成的。比如,在浦镇会出现包机户协助家庭织机户购买织机的情况,由于家庭织机户会因为经济困难或扩大规模而资金短缺,包机户会先借钱给家庭织机户购买织机,而所借的钱从家庭织机户为包机户代加工的加工费用中慢慢扣除。这种反向的欠账,其前提自然是包机户与家庭织机户已经有合作关系,而且他们之间的资金结算是按照社会时间来欠账的。

对于包机户来说,有了先前的这一层欠账关系,这笔欠款的风险是可以规避的,同样对于家庭织机户来说,向包机户预支这笔买织机的费用可以有效地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实际上,当社会时间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规则后,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包机户会利用前文讲的逐级欠账来实现资本积累,并利用其现金流优势来反向借贷。简答地说,有一部分包机户利用社会时间机制,不仅解决了自己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还积累了大量的现金,这些资金成为其反向借贷的重要前提。下面以更

为下游的印染厂为例来加以说明。

案例 6: DSH 从 1989 年开始在浦镇的一家乡镇企业做染色技术工, 1998 年底乡镇企业转制后, 先是承包转制后的这家民营印染厂的一条生产线, 后于 2001 年逐渐分离出来成立单独的印染厂。从 1998 年开始, DSH 认识了某印染原料供货商, 与其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DSH 与该原料供应商的结算方式也是欠账, 经过多年的合作, 结算周期也从 3 个月推到了半年。然而, 由于结算周期的拉长, 特别是 DSH 的印染厂需求量特别大, 比如 2013 年产值已过 2 亿, 这就导致该原料供应商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资金压力。因此, DSH 利用他所说的“潜规则”——“欠账”, 来与该原料供应商协商, 他向该供应商提出, 与其向银行或他人借贷, 不如直接向 DSH 借款, 然后支付一定利息。原料供应商同意这种办法。

反向借贷的具体操作办法, 以 2014 年 3 - 6 月为例: (1) 由于商定货款结算为半年一结算, 供应商资金回流周期为半年, 所以, 第 1 个月的货款到 6 个月后结算, 即 3 月份货款要到 9 月份结算; (2) 供应商借贷金额不超过 DSH 所欠总额, 比如以 3 - 6 月为计算单位, 6 月份供应商能向 DSH 借贷的总额, 不超过这 3 个月的 104 万原料欠款总额; (3) 借贷利息为 3 分, 如果供应商借贷 100 万, 即以 3 个月欠款额度为借贷周期计算, 那么每借贷一次供应商需支付 9 万利息。实际上, 原料供应商会选择足额借贷, 以制造类似现金交易的效果。从 DSH 的案例中出现的一“欠”一“借”可以看出: 首先, 对于 DSH 来说, 他的借贷规模由于限定在欠给供应商原料货款的总额度范围内, 所以就不用承担风险, 而且还可以从中赚取一部分利息, 最差的情况不过是现金交易; 而对于供应商来说, 虽然支付了 9 万元利息, 但他做的每笔生意都相当于现金交易, 缓解了因欠账而出现的资金压力。这类似于双方都满意的协定。事实上, 在浦镇, 由于现金紧缺, 还会出现现金交易可以适当打折的情况, 即现金交易往往要比这种欠账来得便宜。所以, DSH 的这种做法也在原料供应商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在 2014 年笔者遇到该案例的时候, 该原料供应商由于借贷规模还差 1 个月货款欠款才到 100 万, 为了能提前向 DSH 借贷到 100 万, 迫于资金压力, 宁愿再多支付 1 个月的利息给 DSH。可见, 这种反补机制的出现也是迎合了普遍存在的资金

短缺问题。

显然,这种反向的借贷与“三角债”不同。“三角债”是一个相互拆借的循环链条,在资金短缺条件下,它会导致债务越积越多,是一种累积型债务关系,而这里的反向借贷与社会时间机制下的欠账所构成的是一种双向债务关系,不存在“三角债”的累积性关系。并且,这种双向债务关系的特点还表明,这是一种消解式的债务关系:首先,基于社会时间机制的欠账不需要支付利息;其次,反向的借贷虽然要付出成本,比如由于合作关系被“锁定”或借贷要支付比较高的利息,但它是用来抵消或是反补前期欠账造成的资金短缺问题的。因此,由于反向债务机制的存在,社会时间机制才不会因上游资金短缺而出现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的情况。这也是维持中小企业持续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结 语

尽管从关系合同的角度看,欠账只是上下游借助社会关系或市场权力调整资金结算周期产生的现象,但事实上欠账远比这要复杂。也就是说,社区里的企业,如果忽视合同中的时间维度,仅从社会关系和市场权力两个维度来分析,就难以讲明结算周期为什么会呈现出社会时间的特征。因此,本文通过引入时间维度来考察浦镇产业资金链后发现,虽然交易双方是借助关系合同来调整资金结算周期,但其最终能够达成同意基础的结算时间,遵从的却是更为基本的社区中的社会经济生活节奏,也就是说,个体之间协商的结果却是一种非个体的社会性制度。所以,社会时间的出现说明,这种交易关系已经调动了更为基本的社会性资源或制度,把合同关系带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性机制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文中的案例可以看出,社会时间机制还进一步推进了有关合同理论的讨论。

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交易”作为重要分析概念的同时,也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即时交易的假设。关系合同就是从时间维度来呈现交易双方因合同的不完备性、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而不断做出调整的过程。但是,时间在该合同理论中,并没有作为重要的分析内容。或者说,即使把时间带入到合同关系中,不再当作合同执行的时间背景时,也仅把它当作一种约定的某项合同条款而已,比如文中提到的

资金结算周期。那么,把合同的时间维度提升为一种分析概念,是否真的可以推进关系合同的解释力呢?事实上,本文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

正如前文强调的,本文所讨论的合同框架与威廉姆森、哈特等人所讨论的内容有所不同,本文着重探讨的是涉及合同达成的社会条件和内在机制问题。事实上,合同达成的社会条件问题,已经为一些学者如刘世定所重视,且已有过这方面的研究,比如,他对关系合同中的关系内涵的再次挖掘和对嵌入性问题的讨论(刘世定,1999),而文中对浦镇市场交易结构的大幅讨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而要把时间提升到分析概念的层次,就需要把它提升到与“投资专用性”、“剩余所有权”等概念同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只有时间涉及到核心利益或权力关系时,才具有分析意义。

实际上,当时间涉及资金结算问题时,就具备了这种地位。因为在市场交易中,尤其是在资金短缺的条件下,资金结算的周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我们进一步把这种时间概念落实到个案中考察时发现,不同的时间周期具有不同的意义,而社会时间又构成了整个关系合同的关键。因此,这种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的关系合同,其时间分析概念自然就成了社会时间。比较有意思的是,由于这种社会时间已经成为社会性制度,所以,并未出现类似剩余控制权等问题,而是直接演变成一种关系合同得以运行的机制。显然,社会时间的意义,不亚于文中未做讨论的时间所起到的控制和维系作用,比如,包机户通过延迟支付来控制上游家庭织机户和供应商产品的质量并维系与上游的合作关系。

不仅如此,由合同的这种社会时间维度发展出来的社会时间机制,还有效地解释了中小企业何以能够在资金短缺条件下实现快速发展的。从社会时间的角度来看,原先的延期支付现象就演变成了两种不同资金流转周期的时间差,进而使我们看到,借助社会关系和市场权力所形成的产业链,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条融资成本极低的融资渠道。实际上,正是借助社会时间机制实现的逐级欠账和成本分摊,中小企业才得以获得一种在陌生市场交易关系中无法获得的资本“增量”。

最后,社会时间机制还表明,交易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时间反映出的是还款周期的最低尺度。也就是说,当资金结算越来越依赖于这种比个人更具约束力和正当性的社会时间机制时,能否在这种可接受的、已经被最大程度拖延了的还款时限内及时还款,是否具有这种还款的能力,成为被欠账一方判断是否要持续欠账

交易的基本尺度。显然,这种诉诸社会制度的信任反映了当下经济交往中个体间信任关系难以持续建立的困境。与此同时,当交易双方开始依赖社会时间这种制度信任机制时,如何理解和厘清信任机制的这一变化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及社会时间机制隐含的其他后果,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艾云、周雪光,2013,《资本缺失条件下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兴起——以一个乡镇农业市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 波兰尼,卡尔,201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蔡禾、贾文娟,2009,《路桥建设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社会》第5期。
- 费孝通,1999,《费孝通文集》(第三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 傅春晖,2014,《包买制:历史沿革及其理论意义》,《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樊纲,2000,《发展民间金融与金融体制改革》,《上海金融》第9期。
- 格兰诺维特,马克,2008,《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张文宏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耿言虎,2014,《农村赊欠及其市场、关系、文化嵌入性——基于安徽ZX镇绿园商店的个案解剖》,《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2期。
- 郭斌、刘曼路,2002,《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对温州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 哈萨德,约翰编,2009,《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哈特,奥利弗,2006,《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费方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林汉川、夏敏仁、何杰、管鸿禧,2003,《中小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北京、辽宁、江苏、湖北、广东、云南问卷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林毅夫、李永军,2001,《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第1期。
- 刘世定,1999,《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03,《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
- 马克思,2008,《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田志鹏,2014,《社会关系与订单获得——以浙江省丽水市来料加工工业为例》,《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 涂尔干,爱弥尔,199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涂尔干,埃米尔,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
- 威廉姆森,奥利弗,200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田一,2013,《能力圈:来料加工的生产组织形式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晓毅、蔡欣怡、李人庆,2004,《农村工业化与民间金融——温州的经验》,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 谢国雄,1992,《隐形工厂:台湾的外包点与家庭代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3期。
- 张翔,2000,《民间金融、实体经济与制度环境——从交易费用角度对改革后温州民间金融的一种解释》,《金融科学》第4期。
- 折晓叶、陈婴婴,2004,《资本怎样运作——对“改制”中资本能动性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2005,《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周密,2007,《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期限过短的经济解释——兼论“麦克米伦缺口”的弥补》,《现代经济探讨》第2期。
- 周雪光,2003,《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 ,2005,《“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第2期。
- Bourdieu, Pierre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ed.),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 Hubert, Henri 1999, *Essay on Time: A Brief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ime in Religion and Magic*. Trans. by Robert Parkin and Jacqueline Redding. Oxford: Durkheim Press.
- Macneil, Ian R. 1978, “Contracts: Adjustment of Long-Term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Classical, Neoclassical, and Relational Contract Law.”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2.
- Mead, George Herbert 2002,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 Mukerjee, R. 1943, “Time, Technics and Societ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27.
- Nyland, C. 1986,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Work-Time Though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 Sorokin, P. A. & R. K. Merton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Past and Present* 38.
- Thrift, Nigel 1981, “Owners Time and Own Time: The Making of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1300 – 1880.” In A. Pred (ed.),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 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agerstrand*. Lund: Gleerup.
- Young, Michael K. 2002,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发展系
责任编辑:杨典

MONOGRAPHIC STUDY

Sociology of Time and Space: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Talcott Parsons’s Social Theory

..... *He Jian* 1

Abstract: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sociologists Barbara Adam, Anthony Giddens and Patrick Baert,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Talcott Parsons’s social theor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ctually Parsons is not a structural-functionalist; in fact, his theory of action system is essentially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structure-processes”. The dimension of time is an internal factor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his theory. For Parsons, time is not irrelevant to “problem of order”, but has substantial relevance to interactions, interchange, change, etc. On the one hand,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time becomes internal element of social theory i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present” embodies emergence and sociality, in other words, it is about differentiation, boundaries, relationships, the change of mediums, and so on. On the other hand, think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anners to realize the shifts of systems over temporal dimension; in fact, the thinking time has been the shifting processes among systems.

How Does Market Operat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pital Shortage? A Study of Social Time Mechanism of Textile Industry of Pu Town

..... *Li Yingfei* 21

Abstract:Based on the case of textile industry of Pu Town, this paper brings in social time mechanism to illustrate how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SM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apital shortage are realized through costallocation and massive graduated debts in the production chain. 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al contract, this paper adds a dimension of time, which is called social time mechanism, to those of market power and social relations. By this social time mechanism, the author expands the meaning of credit, highlights the restriction of repayment capacity and repayment period

on trading process. Then the author uses this model to explain how the two trading parties adopt the capital settlement period developed under such mechanism to adapt to and promot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in absence of third-party credit guarantee.

PAPER

Rights Arrangement “For the Market” VS. Protecting Society “To Discard Marketization”: On the debate between Douglas North and Karl Polanyi *Wang Shuixiong* 47

Abstract: Karl Polanyi’s idea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mainly based its theory on the comment that labor, land, and money were treated as fictitious commodities in the 19th century; however, Polanyi made a mistake in this cornerstone of his theory: He considered what exchanged in the market as a physical entity instead of a right to perform certain (physical) actions. Thus his analysis of “embeddedness”, “market socie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are vague and imprecise. Comparing Polanyi’s idea with that of Douglas North would be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per, basic unit of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of sociology, and the necessity of setting up a suitable analysis theory.

The Self-centred Philanthropist: Family involve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private enterprises *Zhu Bin* 74

Abstract: Thoug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ystematic studies on CSR of China’s enterprises are absent from academic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amily involvement in CSR of private enterprises. Using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Data in China, the paper reveals that, on the one hand, family involvement will improve the CSR investment towards community stakeholders; on the other hand, family involvemen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CSR of contractual stakeholders. With the influence of “*chaxu geju*”, the author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at Chinese families tend to shift between different logics of behavior when faced with people with whom they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hips, and bring the action model into company when they engage themselves i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affairs.

Assisted-type Government: On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in the era of “governing the state through programs” *Fu Wei & Jiao Changquan* 98

Abstract: After rural fee reform,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